

[设计理论]

社会科幻中的叙事思维与虚构物

张雨蕾¹, 芦影^{2*}

1. 同济大学, 上海 200092;

2. 中国传媒大学, 北京 100024

摘要: 围绕社会科幻的叙事思维和虚构物展开研究, 试图追寻科幻作品的灵韵, 探求其在审美性和娱乐性之外的意义。研究充实和完善了社会科幻这一既有的科幻子类型的定义, 并且归纳出其内部的共性特征、划分出四种不同类型。社会科幻的叙事通过未来想象与思维实验的相互作用完成, 借由“创世之举”和“蝴蝶效应”两种叙事模式, 现实的人文社会议题被转化为科幻叙事。虚构的设计物将未来想象具象化, 完善了科幻叙事所建构世界的细节。为了厘清社会科幻的价值观体系及其对现实的意义, 追溯了社会科幻中两种叙事取向的历史渊源, 以乌托邦到反乌托邦的当代视野来统摄社会科幻及其下的诸多附属概念, 明确了社会科幻整体对现实的反思, 以及其不同类型的建构性价值、批判性价值和思辨性价值。

关键词: 社会科幻; 科幻叙事; 设计虚构; 乌托邦与反乌托邦

中图分类号: J52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6-6946(2024)05-0001-11

DOI: 10.19798/j.cnki.2096-6946.2024.05.001

Narrative Thinking and Fictional Object in the Social Science Fiction

ZHANG Yulei¹, LU Ying^{2*}

1.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92, China;

2.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24,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study the narrative thinking and fictional object in the social science fiction, trying to trace the spirit of science fiction works and exploring their significance beyond aesthetics and entertainment. The definition of social science fiction, an existing sub-genre of science fiction, is enriched and improved and its common characteristics are summarized and divided into four different categories. The narration of social science fiction is completed within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future envisioning and thought experiments. The humanistic and social issues that point to reality are transformed into the narration of science fiction through two narrative modes, "the Genesis" and "the Butterfly Effect". Fictional design objects concretize future envisioning and improve the details of the fictional world which is constructed by science fiction narratives. In order to clarify the value system of social science fiction and its significance to reality, the historical origins of the two narrative orientations in social science fiction are traced, and the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 from utopia to dystopia is used to arrange various subordinate concepts of social science fiction, figuring out the overall reflection of social science fiction on reality, as well as the constructive value, critical value and speculative value of its different categories.

Key words: social science fiction; narration of science fiction; design fiction; utopia and dystopia

收稿日期: 2024-04-10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一般项目(19BG117)

*通信作者

社会科幻是一种科幻子类型,其重点关注社会的未来形态和技术造成的社会影响,是科幻小说与思辨文学、推测小说、社会小说、乌托邦文学的交叉领域。社会科幻以投射现实问题、构想社会形态、关注人类境况、探讨人文社会议题为特征,依据不同的价值指向可分为理想型、变革型、批判型和综合型四种类型。

一、重释社会科幻

(一) 社会科幻的起源与概念

社会科幻(Social Science Fictions)是科幻在蓬勃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子类型之一,处于科幻与思辨文学、推测小说、社会小说、乌托邦文学等领域的交叉地带(见图1)。这一概念由著名科幻作家艾萨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在1960年首次提出,在原有语境中与“惊险科幻”和“新发明科幻”并列,是对当时已出现的科幻作品和文化现象所做的归类总结,但并未进行明确定义。笔者认为,社会科幻是一种重点关注社会的未来形态或技术造成的社会影响而非物理世界与技术本身,且更强调社会整体景观的呈现而非仅仅是个人英雄主义叙事的科幻虚构类型。

经历了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的19世纪的欧洲,为最早的科幻或者说“科幻前身”^①的诞生提供了推崇理性认知、尊重科学逻辑的思想条件。进入20世纪,美国廉价杂志的兴盛和大众文化的繁荣则为科幻这种依托于通俗文学起家的叙事题材提供了广泛传播的媒介基础。1927年,《惊奇故事》主编雨果·根斯巴克(Hugo Gernsback)正式命名了“科幻”(Science fiction)一词,

而后他的继任者约翰·坎贝尔(John Wood Campbell)在1937年将杂志更名为《惊奇科幻》,带领一大批作家开启了科幻的黄金时代^②,掀起强调科学含量和严谨度、秉持技术乐观主义的“硬科幻”^③热潮。到了1950年,部分科幻的关注重点转移到科学技术本身之外,由《奇幻与科幻杂志》和《银河科幻小说》两本新杂志开启了“社会科幻”的纪元^④。而始于1958年的科幻新浪潮运动及其派生出具有特定时期指向性的“新浪潮科幻”^⑤,则出于对黄金时代硬科幻作品中技术决定论和科技乐观主义的反叛,着眼于社会学、政治学、哲学、心理学等人文社会学科,为“社会科幻”注入了更多的活力。1970年前后,科幻新浪潮运动随着试图弥合其与黄金时代科幻之间裂隙的折衷主义作品出现而被终结,部分“社会科幻”开始与硬科幻相融,作为不受固有年代指涉局限的概念走向了多元化的发展。

(二) 社会科幻的共性特征

1. 对现实问题的投射

与对科幻的刻板印象中那种竭力营造迷雾重重的神秘氛围,精心安排跌宕起伏的冒险历程,构思引人入胜的新奇体验不同,社会科幻的一大重要特征是对现实的介入,这也使其与单纯的消遣读物区分开来。社会科幻的虚构文本使用隐喻或反衬的修辞,将现实社会中所存在的症结投射到科幻叙事中,引发读者对于真实世界现存问题的关注和思考。

隐喻现实的社会科幻通过文本中构建的世界、事件与其对应现实的相似性引起共鸣,再经由夸张和戏剧性处理强化现实的阴暗面,最终表现为一种极端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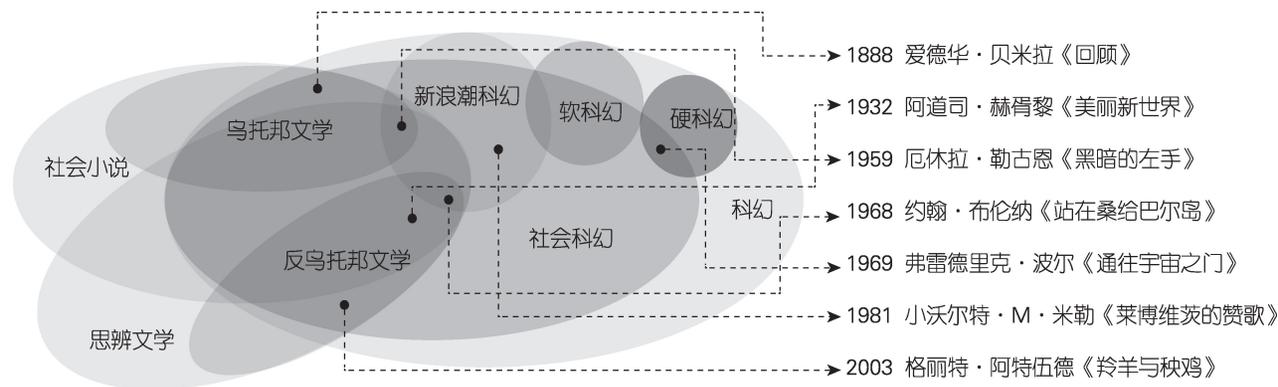


图1 社会科幻的范围及范例

① 玛丽·雪莱、儒勒·凡尔纳等人的文学创作。

② 通常指1940年到1950年,以宏大叙事、太空歌剧、英雄史诗式的科幻作品为主。

③ 以物理学、生物学、化学、天文学等自然科学议题为主的科幻作品类型。

④ 特指1960年到1970年科幻新浪潮运动期间产生的作品,尽管有时也包括后来风格相似的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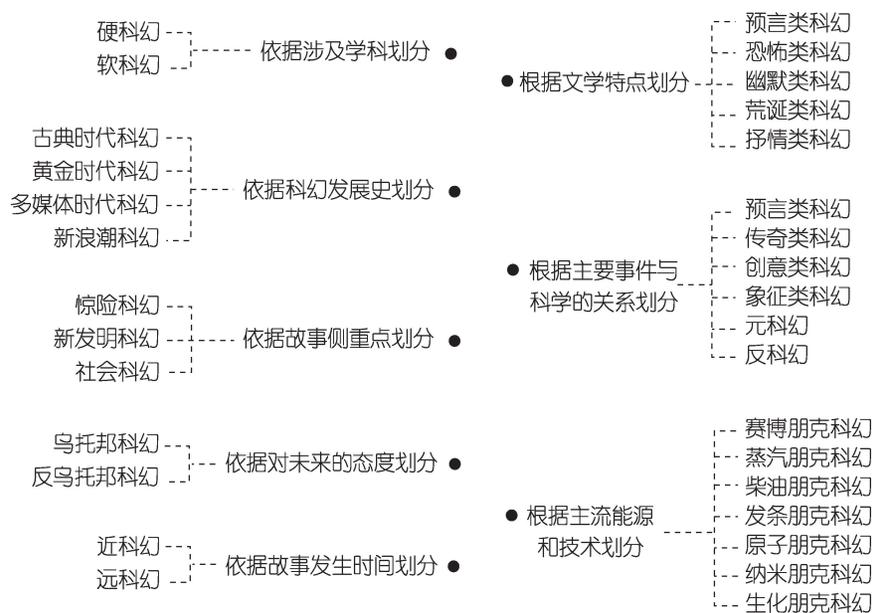


图2 科幻既有的子类型及其分类方法

化的状况,以达到讽刺现实、为可能的现实走向敲响警钟的目的。如乔治·奥威尔的《1984》中所刻画极权主义大国“大洋国”的大不列颠行省 Airstrip One,其独裁领导人“老大哥”带领思想警察对大众实施的大规模监视及个人崇拜宣传;以及1920年叶甫盖尼·扎米亚京的《我们》(We)中完全由玻璃建造的“全景监狱”式的城市,人们的行为、服装都被统一规划,公民没有名字而是用编号来区分彼此。这些科幻叙事中对苏联时代社会现实的隐喻会唤起观者的熟悉感,由此对虚构文本的原型产生推测,最终使其关注点回归到对应的现实问题中。

反衬现实的社会科幻则通过建立一系列与现实截然相反的状况或是理想化的现实,给观者带来熟悉又陌生的体验,用美好的虚构世界衬托出现实的不如意,使人反思当前的现实是否存在替代版本,是否应该被改变。例如1890年威廉·莫里斯的《乌有乡消息》(News from Nowhere)即是通过描述主角梦境中的实现了共产主义的未来社会,来反衬作者所处时代下资本主义的不堪现实;又如1888年爱德华·贝拉米的《回顾》(Looking Backward)中,主角进行时间旅行所到达了已实现社会主义的未来乌托邦,反衬出作者身处经济大萧条时代所感知到的社会现实。科幻叙事中的理

想世界与现实社会所产生的对比与差距,使得观者心理产生落差,进而制造出一种对现实的荒诞感,由此催生对现实问题的反思和对现实其他可能性的想象。

2. 对社会形态的构想

对社会的具象构思是社会科幻最为突出的特征,其中囊括了政治形态、经济形态、意识形态、社会形态四个层面的设置。政治形态上,具有乌托邦倾向的社会科幻通常选择如《乌有乡消息》《回顾》《仙女座星云》^⑤中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或是《瓦尔登二号》^⑥《只有恋人还活着》^⑦的无政府主义政治体制,这类虚构社会阶层上则趋于扁平,呈现出“人人平等”的理想化社会面貌;具有反乌托邦倾向的社会科幻则可能选择如《1984》《我们》中社会成员之间通常有着森严的等级制度、贫富分化严重的极权主义社会;介于两种倾向之间的社会科幻则会将几种不同政治形态的社会置于相邻的国度、星球或平行世界里,如厄休拉·勒古恩的《失去一切的人》^⑧《世界的词语是森林》《黑暗的左手》等作品,其中不同势力间形成的鲜明对比能够激化读者的辩证思考。

社会科幻中对经济形态的构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政治形态的抉择,如公有制经济或私有制经济、计划经济或市场经济都与社会主义制度或资本主义制度相

⑤ 作者为伊·安·叶弗列莫夫,俄文原版标题为Туманность Андромеды(1967)。

⑥ 又译作《桃源二村》,作者为B.F.史基纳,英文原版标题为Walden Two(1948)。

⑦ 作者为戴夫·沃利斯,英文原版标题为Only Lovers Left Alive(1964)。

⑧ 又译作《一无所有》,英文原版标题为The Dispossessed An Ambiguous Utopia(1974)。

挂钩,过剩经济和短缺经济则可以根据主旨更加灵活地选择。要构建理想社会或批判消费主义的社会科幻可能会倾向于经济繁荣、物质富足的社会形态,如《太空商侯》(*The Space Merchants*)和《迈达斯瘟疫》(*The Midas Plague*);将故事置于末世灾难背景下的社会科幻则更可能选用经济紧缩、资源匮乏的社会形态,如1959年小沃尔特·M·米勒的《莱博维茨的赞歌》(*A Canticle for Leibowitz*)。

社会形态还涉及到权力关系、家庭与婚姻制度、后代的生育和教养等方面的构想。首先,此处的权力关系特指受到优待的主流群体和受到压迫或边缘化的弱势群体之间的权力关系,如前文已述厄的勒古恩诸多作品及《时间边缘的女人》^⑨《神们自己》^⑩《使女的故事》^⑪中的性别权力关系,又如1936年卡雷尔·恰佩克《鲑鱼之乱》(*War with the Neuts*)中的种族权力关系,或是1951年怀曼·盖因的《疯人院之外》(*Beyond Bedlam*)和1962年J.G.巴拉德的《疯子们》(*The Insane Ones*)中,疯癫者与将其管制之人的权力关系等。这种权力关系通过主流群体将自己置于“正常”的主体地位,将其他群体视为“非正常”的他者,再渗透至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中,乃至影响主流群体和边缘群体间政治、经济地位上的差异。其次,家庭是最小的社会基本单元,家庭的结构也极大地影响着社会形态,而婚姻和生育所产生的血缘则是最常见的家庭纽带。除了真实世界中最为广泛存在的父系社会和曾经存在过的母系社会,社会科幻还构想出与现实差距很大的情况,如《美丽新世界》中家庭和婚姻消解,或是《神们自己》中多伴侣的婚姻和家庭制度。此外,后代的生育和教养方式也反映了一个社会如何通过代际传承维持现状,如《时间边缘的女人》中人工繁殖、孤雌生殖等技术,《瓦尔登二号》及《美丽新世纪》中对孩童的社会化抚养、条件反射训练、心理控制教育等。

3. 对人类境况的关注

社会科幻关注人类个体生存境况,体现了其人文主义关怀,这一特征有时容易被忽视。这种关注集中体现于包括主角在内但不限于主要角色的所有个体,在某种社会中生存时拥有人性、自由意志、思想与智

识、幸福感的水平和状况,而其又受到虚构文本中社会形态的决定性影响。

社会科幻十分关心在特定的社会发展阶段或特定科技的影响下,人性是否会泯灭、人是否被异化。故事中来自社会制度或宗教信条的规训和束缚,通过审查、监视、洗脑等行为,都有可能削减或剥夺人类个体的自由意志,如《1984》中通过无处不在的思想警察对民众实施的政府监控;以及《使女的故事》中在人类大规模失去生育能力后,被宗教驯化为权贵生育工具的使女;又如《戴夫之书》(*The Book of Dave*)中一个普通出租车司机因与前妻的矛盾在日记中写下的厌女言论,在几个世纪后被洪水毁灭文明的人类发掘出土,成为了整个社会压抑女性的宗教圣书……在这些科幻叙事中被剥夺自由意志、被规训、被异化的角色设置背后,体现出社会科幻对人类精神境况的关注,以及对于系统性思想控制的批判。

其次,社会科幻对人类思想、智识水平的担忧则来源于现实中的反智主义现象,如1953年雷·布拉德伯里在《华氏451》(*Fahrenheit 451*)构建的抑制思想的禁书社会中,消防员的工作是焚书;又如《莱博维茨的赞歌》中核战争将现代文明毁灭后的末日世界,修道院保存着人类文明遗留的知识并为重建文明做准备;以及乔治·R·斯图尔特1949年在《地球家园》(*Earth Abides*)因传染病而衰落的文明中,复杂精妙的科学技术失传而人类重新开始采用原始简陋的工具……类似的社会科幻作品关注人类的思想境况,反智主义的现实趋势在文化审查制度、愚民政策、垄断思想、文明崩溃等情节安排的催化加剧下,呈现出一种文化与知识失传的未来可能性。

此外,幸福感也是人类精神境况中一个充满复杂性与矛盾性的议题,社会科幻中有《美丽新世界》这样利用药物麻痹痛苦,遗忘现实,以牺牲自由意志为代价换取幸福感的手段;也存在如《瓦尔登二号》中的实验社区一般,以自我控制、自我激励的行为主义心理学指导获得幸福感而同时不失去自由的构思。这些科幻叙事关注人类的心理境况,从不同的视角切入讨论幸福感的议题。

⑨ 作者为玛吉·皮尔西,英文原版标题为 *Woman on the Edge of Time*(1976)。

⑩ 作者为艾萨克·阿西莫夫,英文原版标题为 *The Gods Themselves*(1972)。

⑪ 作者为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英文原版标题为 *The Handmaid's Tale*(1985)。

4. 关注人文社会议题

科幻学者达科·苏恩文(Darko Suvin)在《科幻小说变形记》中写道,诸如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这些同样建立在科学方法之上的“软学科”可能比“硬”的自然学科能够更好地成为优秀科幻小说的基础^⑫。社会科幻正是在众多科幻子类型中显示出对人文社会议题浓厚兴趣和独特见解的一个类别。究其原因,固然存在社会科幻的创作者希望在黄金时代的传统科幻模式中推陈出新的因素,还有随着科幻逐渐摆脱了作为科普自然科学知识的青少年读物的职能,开始重视起文学性和实验性,以及越来越多人文社会科学背景的作家加入到科幻创作领域中的缘由^⑬。

一些作者由于自身的学科背景以及成长环境下的文化熏陶,对特定的人文社会学科尤为关注,作品中也反复出现相关学科的议题,如人类学家查德·奥利弗(Chad Oliver)就尤其偏好人类学议题,他许多科幻作品中的主人公都被赋予了人类学家的身份,并对外星人进行田野调查。而出生于人类学家庭的科幻作家厄休拉·勒古恩(Ursula K. Le Guin)^⑭的众多作品中都折射出人类学思想,体现了神话、文化和语言对社会与人的塑造。

此外,对虚构世界中的哲学观进行构想是社会科幻对人文社会议题兴趣的表现之一。譬如,1930年W.

奥拉夫·斯塔普雷顿在《最后与最初的人》(*Last and First Men*)中讲述文明覆灭、复兴、再毁灭的故事往往呈现出历史循环论的哲学观;而《索拉里斯星》(*Solaris*)和《盲视》(*Blindsight*)中人类试图与外星生命沟通却无果的故事则被笼罩进了不可知论的疑云中;《你一生的故事》(*Stories of Your Life and Others*)中增加时间维度把世界理解为四维空间的观念则直接导向了宿命论的结果。

社会科幻同时也探讨道德伦理相关的议题,例如1981年道加尔·狄克逊的《人类灭绝之后的动物》(*After Man—A Zoology of the Future*)和2003年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羚羊与秧鸡》(*Oryx and Crake*)等反思以人类为中心构建起的社会和价值观的作品:质疑以人类为原型推测外星生命形态或创造人造生物的高傲自大态度,试图体会人类之外的生物的生存境况,请问人类榨取这些生物价值的行为是否应该受到道德审判。

(三) 社会科幻的四种类型

根据介入现实中人文社会议题的方式,本文将社会科幻划分为四种类型:理想型社会科幻、批判型社会科幻、变革型社会科幻和综合型社会科幻,如图3所示,而这又决定了其各自相异的价值指向。以下对四种类型的社会科幻和其对社会现实的价值进行说明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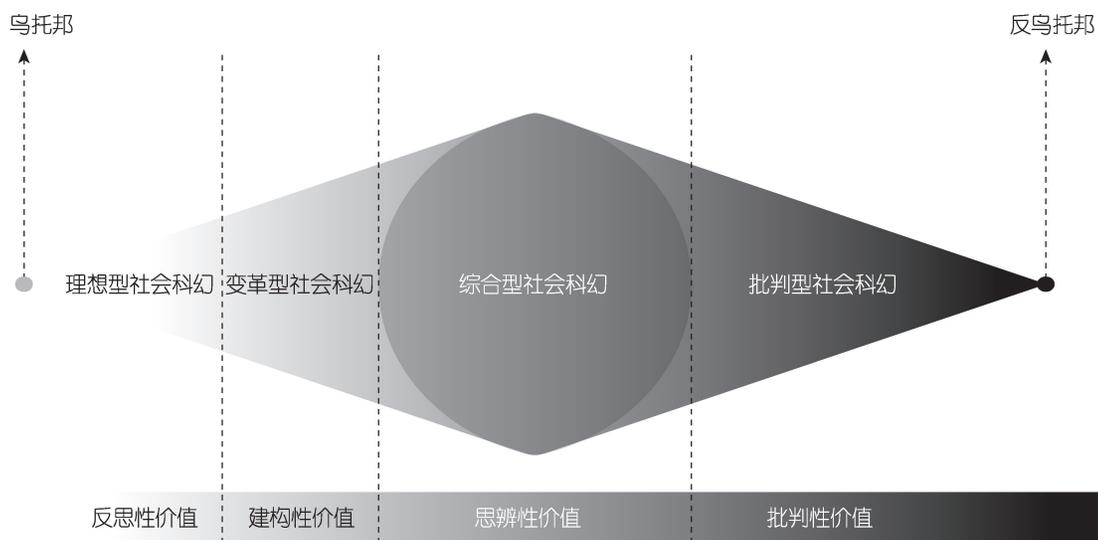


图3 社会科幻的四种类型及其在科幻叙事当代视野中的分布

^⑫ 与之相对,硬科幻的作家大多拥有自然科学背景,如黄金时代的“科幻三巨头”,艾萨克·阿西莫夫是一名生物化学教授,罗伯特·海因莱因则拥有物理学背景且担任过工程师,亚瑟·克拉克担任过雷达技师后获得数学和物理学学位。

^⑬ 厄休拉·勒古恩的双亲都是人类学家

区分。

1. 理想型社会科幻

理想型的社会科幻善于处理现实中无法解决的议题,它通过将条件或过程理想化的方法,剥离现实中无法排除的干扰因素,构建仅在逻辑和理论上合理的高度理想化社会。这样的虚构世界由于与现实差距巨大,能够在特定议题上引发观者的陌生感从而激起思考和争论。同时,由于其高度理想化的特征,理想型社会科幻并没有正视和直面现实问题,仅仅是将其抹去或避而不谈,被忽视的干扰因素在未来的现实中依然存在,因而对现实不具备指导性作用或建设性启发。不过,尽管理想型社会科幻对待现实议题的方式存在逃避主义倾向,它对现实的质疑精神还是毋庸置疑的,它所虚构的“陌生化世界”有助于唤醒读者对习以为常的现实情况的麻木,促使读者反思当前现实的合理性。

2. 变革型社会科幻

变革型社会科幻由于和上一种类型同样对未来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容易被简单地一起纳入乌托邦范畴中,从而造成概念混淆。变革型社会科幻并不会理想化一切阻碍因素,而是在接受和面对现实的缺憾后,变革、改进当前的社会现实,产生建设性、具有实践意义的构思。其虚构的世界并非永远无法到达的乌有之乡,它介于现实与理想的中间状态,优于当前现实,但有望成为未来的现实。它提供了现实的一种可能性走向和替代版本,对社会革新具有建设性及前瞻性作用。这种介入现实的方式决定了变革型社会科幻能够造成的陌生化认知程度更小,其想象的未来是“近未来”,其虚构手法更加现实主义,切入视角则更加微观。

3. 批判型社会科幻

批判型的社会科幻挖掘现实的阴暗面,推演负面情况向极端化发展的未来社会,它通过重现已存在的社会现实,揭露其中的问题和缺陷,实现社会批判的目的。这个类型的虚构文本通常呈现出一种对未来消极悲观的态度,然而这可能仅仅是对身处当下的读者敲响警钟的必要手段。经由虚构文本夸张后的恶劣环境和压抑氛围,天然地为叙事提供了戏剧冲突和主角成长的空间,从而比其他类型的社会科幻在叙事艺术上更具优势。弗里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在

《未来考古学》一书中就曾暗示性地表明,这是一种容易产生出有趣和激动人心故事的社会秩序^[3],相较于乌托邦式的科幻,批判型社会科幻很难让人感到枯燥乏味。

4. 综合型社会科幻

综合型社会科幻灵活地在不同现实层面选择能够服务主旨的虚构方式,构建了一种比大多数幻想文学更加接近现实状况的复杂世界。它很难纯粹地被定义为乌托邦或反乌托邦,它的文本同时呈现其中虚构社会的积极面向和消极面向,或是将其置于从乌托邦化趋势到反乌托邦化趋势的动态变化之中,让读者无法从现实世界和幻想世界中简单地二选一。相反,读者在被迫面对这种高度复杂的“现实”时,摆脱了单一化视角,不得不开始进行辩证性思考。

二、社会科幻的叙事与虚构

(一) 科幻叙事的点域与场域

在笔者看来,未来想象是科幻叙事概念化的“点域”,而思维实验是科幻叙事情景化的“场域”。社会科幻的一则叙事文本中包含多个未来想象的概念点,这些点在叙事逻辑的作用下共同促成了一场思维实验。社会科幻中的叙事是通过未来想象的点域与思维实验的场域相互作用下完成的。

未来想象不同于空想、白日梦和奇幻式的天马行空,“未来”二字所暗含着“将会到来”的时间节点给虚构内容提供了科学上的合理性和潜在的技术支撑,这一时间维度为现实与想象之间搭起逻辑的桥梁。社会科幻通过将某种需求或趋势置于未来时空中,依托于科学的理论或假设进行符合逻辑的构想,运用未来想象虚构那些在推论中可能实现的概念,构建了“具体现实”的理想化版本。思维实验指用纯粹理性对现实中无法做到的抽象实验进行推演,社会科幻通过在现实基础上改变思维实验的“参量”和“条件”来处理核心议题,使未来的某种可能性在实验过程中得以显现,引发进一步的思考。思维实验内部又可划分为思想实验和理想实验^[4],前者指受制于当前技术条件,只能依靠原理进行逻辑推论的思考过程;后者指理想化实验过程和对象,从而排除实际干扰的思考方式。而作品的类型归属也决定了其所选择思维实验的种类,例如,变革型和批判型的社会科幻都使用思想实验,理想型社会科幻使用的则是理想实验。

以《美丽新世界》中对“生育与培育中心”的设置为例,其中的受精员与受精室、孕育新生儿的培育器、命运规划室、从阿尔法到艾普斯隆的社会等级制度、新巴甫洛夫培育室、睡眠教育等都可以被视为相互独立的概念,围绕其核心展开点域式的未来想象。所有这些点域之间的相互作用构成了这部作品中的其中一场思维实验:即一个不存在婚姻与家庭的社会,通过人工授精培育新生儿,在培育过程中为不同的胚胎进行社会等级制度的标记,决定其一生的命运规划,并通过行为强化和睡眠教育灌输对婚姻和家庭的厌恶,以及作为不同社会等级制度成员应有的喜好、行为模式和思考方式。由此,这些自概念中心发散的点便构成了思维实验的场,科幻叙事得以在一个或多个思维实验的场域中展开。

未来想象为思维实验的顺利进行提供了支撑,是思辨得以展开的先验条件;而思维实验则为未来想象的孤立存在提供了语境,是思辨发生的整个过程和场所;最终得出的社会科幻的叙事文本可看作这种思维实验的结果与记录。在这种相互关系中,社会科幻成为了可供探讨STS^⑭问题的话语空间,以根据现实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境遇,来推想科学技术的可能走向,并在思维实验中探究这种具体的未来想象会如何反作用于社会现实及人类境况的各个方面。

(二) 社会科幻的叙事模式

社会科幻的叙事形成于未来想象与思维实验的相互作用中,而这种叙事使得实存的人文社会议题被转化为科幻文本。而社会科幻也通过“创世之举”^⑮与“蝴蝶效应”^⑯两种叙事模式,使现实中的人文社会议题得以“科幻化”。

“创世之举”的叙事模式近似于开启“上帝视角”——从零开始创建一个全新的世界,这样的虚构世界与现实之间有着显著的差别。这一叙事模式从现实的多个方面切入,同时展开对多个议题的未来想象,对社会的各个方面进行异于现实的设置和构想。以《美丽新世界》为例,文本先后虚构了一个社会的不同层

面:高度繁荣的科技和经济发展水平;试管培植的生育方式;由基因决定社会阶层和职业分配的等级制度;由睡眠学习和条件反射等手段达成的意识形态灌输;将婚姻、家庭、爱情视为远古野蛮词汇的价值观念;借助致幻剂麻痹负面情绪的社会习俗。“创世之举”的模式通过在文本中显现从现实捕捉到的社会趋势,依托于理论上合乎逻辑的潜在事物,将对具体技术、制度、观念的想象置于未来时空,针对多个人文社会议题展开了叙事。同时,这种叙事模式重置了思维实验的所有发生条件,使得虚构故事拥有完全独立于现实的世界观设定,并在这一全新的完整世界观下推演服务于主旨的动态事件。

“蝴蝶效应”的叙事模式则是在现实基础上修改“条件”,为思维实验增添“变量”,其中对“条件”和“变量”的未来想象可以包括某种技术、某种法令、某种思潮,某种事件……这种科幻叙事保留了大部分的现实事物和状况,容易让人产生代入感,但是那种微妙而关键的未来想象,却会在貌似接近现实的虚构世界里泛起层层涟漪,改动整个社会的走向,最终使其完成异于现实的叙事。山田宗树的《百年法》所构建的社会与现实里经济衰退、少子化、高龄化的日本社会如出一辙,为了突出“高龄社会”这一特点,作者设计了“不老化技术”这一未来想象。这场思维实验中关键性的“自变量”在于一道限制生存时间的法令,接受了这项技术的人必须在百年之后放弃包括生存权在内的基本权利,接受安乐死。在这个前提下,科幻文本继续推进对社会其他方面“因变量”的推演,探讨了诸如长生不老背景下人类无限膨胀的生存欲望,与人类求生本能相冲突的强制性安乐死,牺牲老龄化人口达到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手段等相互矛盾的人文社会议题。

(三) 辅助叙事的虚构物

尽管前文已总结出科幻叙事的整体思路和模式框架,然而要创建一个完整的虚构世界,还需对叙事的细节进行微妙把控。正如设计研究期刊《设计问题》的创始人和编辑维克多·马格林及理查德·布坎南看来,设

^⑭ 科技与社会(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关注科技与社会相互影响的跨学科研究。

^⑮ 化用了人类对于世界起源的观点之一创世论(Creationism)的视角,即更高层级的意识主体世界创建。此处用以概括一种科幻叙事模式:从社会方方面面入手建构出区别于现实的虚构世界。

^⑯ 蝴蝶效应(butterfly effect)原为混沌学中的一种现象,指初始条件的微妙改变会引起整个动态系统的重大变化。此处用以概括与“传世之举”相对的一种叙事模式:在现实世界中改变某些微小因素,从而使推演区别于现实的可能性。

计可以被视作一种思维方式^[5]、一种思考能力,是“人造世界的概念和计划”^[6]。社会科幻在生成虚构世界的叙事过程中,无疑离不开“设计”这种具有高度抽象性、逻辑性、建构性的思维。借助设计思维,社会科幻统筹了整个思维实验的架构,对思维实验的变量、逻辑、过程进行的整体把控,以及对社会形态具体层面的设置。借助虚构的设计物,科幻叙事将未来想象落实到具体层面,设计出对应其社会意识形态的文化符号、生活方式以及各种人造物,从侧面完善了叙事文本所虚构的社会形象。

对虚构世界中的意识形态进行描述是间接表现社会面貌的巧妙手法,意识形态能够透过角色们的话语逻辑、思考方式、价值观念、互动模式,隐晦地描摹出他们所生活的社会,触及了那些难以直接宏观概括的细节。角色们所处的这个社会塑造、引导了他们的意识形态走向,而他们的意识形态也强化、稳固了社会整体的思想状态。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中就以福特主义和基督教为原型设计了一种的文化符号,它从福特T型轿车衍生而来,象征着虚构世界中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福特主义,时刻提醒着人们要整齐划一、泯灭个性。由此,字母T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反复出现在角色们比划出的T字形手势、女主角的T字形项链、城市中的T字形塔楼上。

对文本中虚构的人造物进行设计的思路,与现实中人造物的设计思维较为相似,需要考虑到设计物在虚构世界中的功能、存在价值、使用群体、使用场景、使用方式以及额外的符号象征。这类人造物的设计可以包括虚构世界中的载具、产品、服饰、人造空间等等,是一种虚构的设计物。在仅以文本呈现的作品中,这种具有虚构属性的设计物主要扮演着推进情节发展、完善世界观的作用,少数情况也会因涉及到核心议题成为思维实验的“关键道具”。在转化为视听形式的作品里,虚构的设计物还可能出于烘托氛围、营造美学特质的目的而存在。

在上述虚构的设计物中,一些具有潜力的未来想象会被现实所挪用,从而转化为现实中人造物的设计灵感。譬如,如今现实中随处可见的平板电脑就能在《2001太空漫游》中带有图形用户界面、名为“新闻板”(Newspad)的人造物上找到设计原型;而在《星际迷

航》中的名为“通讯者”(Communicator)的产品上也能看到手机最初的设计灵感。这些案例都有力证明了未来想象中设计思维的运用,以及社会科幻中的设计及设计物对现实的建构意义和启发作用。

正如当代叙事学学者查特曼(Seymour Chatman)在《故事与话语》中所述,叙事话语无须拘泥于特定的表达媒介^[7],科幻叙事也不仅仅发生在小说文本、漫画动画、影视剧、游戏等常见的媒介形式中。设计领域也存在着运用设计物进行科幻叙事的实践:一种剥离了故事文本、以设计为媒介的科幻叙事。“设计虚构”一词最早在2005年意外被科幻小说家布鲁斯·斯特林(Bruce Sterling)创造出来,用以解释设计思维如何影响他的著作^[8]。随后,2009年朱利安·布里克(Julian Bleecker)又在文章中提到,设计虚构是“设计、科学事实和科幻小说的结合”;是制作能够“自己讲述故事的事物”^[9],正式奠定了设计虚构的概念。再到2013年,布鲁斯·斯特林(Bruce Sterling)将设计虚构描述为:“一种通过原型演示和叙事来推演新想法的设计方式”;“对叙事原型/设计物的刻意使用,以悬置关于改变的怀疑”;强调它“不是一种虚构小说,而是一种设计,讲述的是世界观而非故事”,并提到叙事原型能够使观看者更加信服虚构的故事^[10]。2015年,约瑟夫·林德利(Joseph Lindley)和保罗·库尔顿(Paul Coulton)重新将设计虚构定义为“创造一个有‘设计物’的故事世界,以创造一个话语空间”^[11]。

设计虚构通过将潜在需求或技术置于未来时空中进行科幻叙事,从而推演出预设的使用情境以及其为日常生活带来的影响。在2001年伦敦科学博物馆名为“未来产品”(Future Products)的展览上,设计虚构项目“植入式音频牙”(Audio Tooth Implant)以一枚嵌入了电脑芯片的透明环氧树脂牙状模型的形式出现,从而实现俄歇·洛伊索(Auger Loizeau)的目的——激发公众对出于人体增强目的的可植入式技术的思考^[12]。作者建构性地想象了电话的未来形式,设置了思维实验的前置条件,并对这件虚构的设计物可能带来的便利性和潜在的伦理争议保持开放态度,邀请观者一起完成这场思维实验。

设计虚构方法论中的“叙事原型”(diegetic prototypes)^[13]与点域式的“未来想象”不谋而合:都是对

^[13] 设计虚构关注的叙事原型/设计物(diegetic prototypes)是虚构故事中会被实际使用到的产品。

未来时空中的潜在需求与趋势进行符合逻辑与科学理论的构想,虚构出用于“科幻叙事”的设计物;而设计虚构所创造的叙事情境本身就是思维实验发生的场域。除却媒介的差异,唯一的区别在于社会科幻的思维实验往往需要多个设计物,且依从关系为设计物服务于科幻叙事;而设计虚构往往是围绕一个特定的叙事原型/设计物展开一段故事,依从关系则是科幻叙事服务于叙事原型/设计物。

三、科幻叙事的当代视野

叙事范式理论认为,作为角色动机和信念的价值观是故事的主要内容,叙事会邀请人们对他们所存在的现实进行意义诠释与价值建构^[13]。而要厘清社会科幻的不同价值观及其作为一种虚构叙事所特有的现实意义,需要回溯社会科幻中的两种叙事取向——乌托邦与反乌托邦——其各自代表着社会科幻的建构性价值和批判性价值。

(一) 从乌托邦到反乌托邦

乌托邦(Utopia)一词出自希腊语,蕴含“好的地方”和“没有的地方”两重含义。乌托邦思想不仅根植于社会科幻的传统中,也根植于整个科幻领域的发展历程中。社会科幻作为乌托邦文学和科幻小说的重叠部分,成为了科幻小说的雏形,一举将科幻的思想史追溯到了公元前4世纪柏拉图的《理想国》^[14-15]。科幻研究通常绕不开其与乌托邦的亲缘关系,因为科幻被认为“至少是间接地从乌托邦衍生而来”^[2]。构想一种优于当前现实的理想社会形态,似乎是人类文明中共通的本能,无论是西方柏拉图、莱布尼茨、斯宾诺莎和康德等人的哲思^[3,16],还是中国古籍中的“大同社会”和“桃花源”等典故^⑧,都能窥见乌托邦的影子。这种对美好社会的渴求态度暗含了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创建这种乌托邦图景的目的并非仅仅是慰藉心灵,使人沉溺于不切实际的幻想,而是通过展现世界更理想的可能性,将其与当前现实形成鲜明对比以完成委婉的批判,这便是社会科幻的乌托邦叙事的意涵。

这种乌托邦叙事正式成形于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1516年出版的《乌托邦》一书,也是后续所有乌托邦式科幻的起源。尽管这本书比起科幻小说,更容易被归为严肃的乌托邦文学或社会小说,但其中构建

的理想社会原型,演变成了某种反复出现的科幻母题。莫尔借周游世界的旅者之眼,描绘了一个位于海上孤岛的国度,他首次建设性地完整构想出一个没有货币、按劳分配的公有制平等社会,对后来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产生了一定的启发作用。

正如弗里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倾向于将乌托邦划为“讽刺文学”^[9],在莫尔“不切实际的空想”的表象之下,批判的是15世纪欧洲原始资本积累的血腥现实,贫富分化严重、劳动者饱受压迫剥削的社会制度。

在莫尔之后,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和随之兴起的游记小说进一步催化了乌托邦文学的发展。而17世纪由于受到新的地质学及生物学扩张的时间观念影响,乌托邦从最初被置于“地理上遥远的国度”,逐渐转移到遥远的时间尺度上。除了“较好的空间”,乌托邦也开始代表“较好的时间”。乌托邦不再以“他者”的形象出现,转而拥有了历史的坐标,在技术乐观主义的推动下似乎成为了一种有望达到的未来,自此更加接近社会科幻的视野。

反乌托邦(Dystopia)一词从乌托邦衍生而来,却从一开始就站在了乌托邦的对立面,意为“不好的地方”。对乌托邦不加掩饰的否定意味,似乎使其天然地拥有了批判性和反思性的优势。自塞缪尔·巴特勒(Samuel Butler)的《乌有之乡》起,对乌托邦的期许逆转为猛烈的批判。弗里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在《未来考古学》描述了这种转向:“乌托邦视角的日益式微中,它们意味深长地为反乌托邦主义者提供了素材。”^[9]乌托邦原型中为极权主义、官僚主义留下的操作空间被反乌托邦文学挖掘出来,其营造的理想社会图景被重新阐释为意识形态控制下营造的美好表象,乌托邦式的社会形态反而成为了使人异化、剥夺个体自由意志的权力结构。从《乌有之乡》揭示出看似完美的乌托邦内部的种种败绩之后,威尔斯接过了反乌托邦的大旗,再到“反乌托邦三部曲”《我们》《美丽新世界》《1984》的出世,反乌托邦文学发展至最高点。

受反乌托邦文学的启发,一部分科幻小说面对现实社会的弊病,不再采取梦想未来理想社会以反衬现实问题的乌托邦传统,而是转向了对“未来更加恶化”

⑧ 分别出自《礼记·礼运》和《桃花源记》。

的恐惧和忧虑。在经历了前苏联共产主义乌托邦的幻灭之后,人们似乎很难再想象一个非资本主义的未来社会。菲利普·迪克(Philip K. Dick)的《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在1968年作为“赛博朋克”的前身首先出现在了人们的视野中。随后的1984年,威廉·吉布森(William Ford Gibson)的《神经漫游者》完善了“赛博世界”的设定,虚构了一个控制论与垄断资本主义相结合的反乌托邦,“赛博朋克”正式成为一种科幻子类型,进而发展成为一种文化热潮。“赛博朋克”类科幻及其衍生类型^①对无望改善的未来,选择了消极反叛的态度,在虚构世界中将现实社会的黑暗面显露无遗,形成极具讽刺力度的隐喻,以实现当下现实直观的社会批判,并为更加恶化的未来敲响警钟。

(二) 在乌托邦与反乌托邦之间

乌托邦与反乌托邦作为社会科幻中的两种经典的叙事取向,各自代表了最理想的社会与最绝望的社会,加之后者诞生于对前者的反叛和否定之上,看似是完全二元对立的存在。尽管叙事角度有所差异,然而它们对社会现实都保持了质疑的态度,只不过一个选择消除问题来完成间接的讽刺,另一个选择揭露问题进行直接批判。科幻研究学者达科·苏文(Darko Suvin)在《科幻小说变形记》写道:科幻叙事“最终也只能在乌托邦和反乌托邦的视野之间进行创作。^[2]”乌托邦与反乌托邦可以视为虚构世界的两种极化形态,现实却总是介于极端完美与极端恶劣之间。在乌托邦转向反乌托邦成为完成时态之后,介于两者之间或游走于两者之间的综合型社会科幻^②开始涌现,这些作品试图展现更加贴近现实情况的复杂世界,将乌托邦与反乌托邦在时间维度或空间维度上并置,构建出互为参照的社会或处于动态变化中的社会。它们最终连通了孤立的两端,从乌托邦到反乌托邦的叙事区间得以形成。

在这一区间上,乌托邦发挥着它积极的建构性价值:反讽堕落现实的同时也试图构建理想社会的未来图景;反乌托邦则表现出尖锐的批判性价值:反思当下和过去的同时对“最坏的未来”发出警告;而两者之间的区间则展现了思辨性价值,体现出对复杂现实的正反两面所进行的辩证思考。将特定概念转化为两种价

值倾向,有利于从更广阔的视阈理解社会科幻与乌托邦、反乌托邦之间的关系,从而形成更加体系化的叙事思维,来看待不同价值取向的社会科幻。由此,社会科幻的四种类型便可为这一区间所统摄。首先,社会科幻对现实的介入方式决定了其整体的反思性价值和批判态度,反思性价值也是理想型社会科幻的唯一价值指向;而变革型的社会科幻则坐落于乌托邦价值的一端,集中显现出其建构性价值;批判型社会科幻则作为反乌托邦的代名词突出了其批判性价值;最后,综合型社会科幻在乌托邦与反乌托邦的中间区域彰显了它们的思辨性价值。

四、结语

社会科幻作为一种虚构叙事,尤为关注现实中的社会形态、人类境况和其他社会性议题,在隐喻和反衬中与现实产生,引导观者对习以为常的社会现状进行反思。借助未来想象与思维实验,以及不同的叙事模式,社会科幻得以推演出现实中的某种趋势可能导向怎样的未来。虚构的设计物则完善了科幻叙事的世界观建构。社会科幻经历了从乌托邦到反乌托邦激进转变,再到两者的边界逐渐消解,科幻叙事的当代视野在乌托邦和反乌托邦之间建立起来。

变革型社会科幻继承了乌托邦叙事中的理想主义精神和建构性价值,以现存的需求和趋势为基础,推想未来有望实现的设计物,为当前现实提供了参考和启发,体现了社会科幻对现实的建构意义。批判型社会科幻延续了反乌托邦叙事的质疑精神和批判性价值,对现实的阴暗面进行直接披露,并推测更加恶化的状况,以实现当下的讽刺和对未来的预警,体现出社会科幻对现实的批判意义。而综合型社会科幻取各家之长,通过消解乌托邦与反乌托邦的二元对立,在建构与批判并行不悖的基础上,对复杂的现实进行辩证思考,体现了社会科幻对现实的思辨价值。

参考文献

- [1] 詹姆斯·冈恩. 交错的世界[M]. 姜倩,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① 诸如发条朋克、柴油朋克、生化朋克、原子朋克、纳米朋克等。

^② 如《女身男人》《时间边缘的女人》《当改变来临时》《失去一切的人:一个模棱两可的乌托邦》等科幻作品。

- [2] 达科·苏恩文. 科幻小说变形记: 科幻小说的诗学和文学类型史[M].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1: 74.
- [3] 弗里德里克·詹姆逊. 未来考古学: 乌托邦欲望和其他科幻小说[M]. 吴静,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4.
- [4] 刘端直. 论思维实验[J]. 科学技术与辩证法, 1995, 12(2): 26-30.
- [5] 周志. 设计史的乌托邦: 评马格林《世界设计史》[J]. 装饰, 2021(4): 62-66.
- [6] 维克多·马格林. 人造世界的策略: 设计与设计研究论文集[M]. 金晓雯, 熊嫒, 译. 南京: 江苏美术出版社, 2009.
- [7] 姜宇辉. 互动性叙事: 文学与电子游戏之间的跨媒介哲思[J]. 中国社会科学评价, 2024(2): 54-63.
- [8] STERLING B. Shaping Things[M]. MIT Press, 2005.
- [9] BLEECKER J. Design Fiction: A Short Essay on Design, Science, Fact and Fiction[EB/OL]. (2022-03-20) [2022-04-20]. <https://blog.nearfuturelaboratory.com/2009/03/17/design-fiction-a-short-essay-on-design-science-fact-and-fiction/>.
- [10] STERLING B. Patently untrue: fleshy defibrillators and synchronised baseball are changing the future[EB/OL]. (2013-10-11) [2022-04-20]. <https://www.wired.co.uk/article/patently-untrue>
- [11] LINDLEY J, COULTON P. Back to the Future: 10 Years of Design Fiction[C]// Proceedings of the 2015 British HCI Conference. Lincoln: ACM, 2015: 210-211.
- [12] AUGER J. Speculative Design: Crafting the Speculation [J]. Digital Creativity, 2013, 24(1): 11-35.
- [13] 埃姆·格里芬. 初识传播学: 在信息社会里正确认知自我、他人及世界[M]. 展江, 译.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6.
- [14] 赫茨勒. 乌托邦思想史[M]. 张兆麟,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0.
- [15] 江晓原, 穆蕴秋. 新科学史: 科幻研究[M].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6.
- [16] 恩斯特·布洛赫. 希望的原理[M]. 梦海,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3.